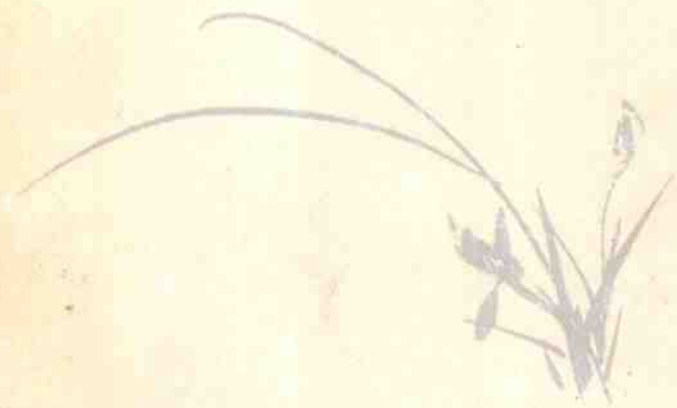


文化人类学理论新视野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New Perspective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ical Theory
Symposium of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周大鸣 何国强 主编

New Perspective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ical Theory

Symposium of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文化人类学理论新视野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周大鸣，何国强 主编

2003年12月

中国·香港

New Perspective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ical Theory

文化人类学理论新视野

周大鸣，何国强 主编

出版者：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地 址：香港铜锣湾邮政 31130 信箱

规 格：889X1194，1/32

印 张：12

字 数：340 千字

出版日期：2003 年 12 月第一版

印刷日期：200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62—8735— 74 —8

定价：港币：28.00 元，人民币：23.80 元

学风与人格的完美统一（代序）

周大鸣，何国强

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共中山市委委员会协办的“庆贺黄淑婳教授从教50周年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8月24—26日在广东省中山市隆重举行。来自北京、云南、广西、甘肃、广东、香港和美国、日本等50多名中外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庆贺在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等人类学领域做出优异成绩的中国著名女人类学家黄淑婳教授从教50周年。这次会议共收到论文30多篇。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专题研讨，就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应用充分交换了意见，进一步探讨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新进展。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便是此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

一、主题：庆贺在人类学领域做出优异成绩的 著名女人类学家黄淑婳教授从教50周年

本次盛会的主题是庆贺在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等人类学领域做出优异成绩的中国著名女人类学家黄淑婳教授从教50周年。

黄淑婳教授是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她原籍广东台山，1930年8月生于香港，1947年进入燕京大学，1952年毕业于该校民族学系。其后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历史系和民族研究所工作，1987年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工作至今。曾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等职。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在五十年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黄先生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开幕式上，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保教授高度肯定了黄淑婳先生在50年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中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和学科精神。他说：

“黄淑媵教授作为女同志，7次带学生深入田野，体现了杨成志教授讲的‘人类学的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学科原则。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黄先生才写出了10本专著和多篇论文，培养了大批的博士、硕士人才。在此，我不仅感谢她培养了人才，而且在丰富中大精神上也做出了贡献。在中国人类学历史上，中大有厚重的一笔。杨成志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只身一人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做研究，带出了一批著名学者如梁钊韬先生等，黄淑媵先生所体现出的正是这种科学的、求实的精神，这也正是高等教育崇尚的精神。”

随后，国家民委政法司副司长、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副会长田联刚先生、中共中山市委常委邓小兵先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李善如先生、日本东京都立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渡边欣雄先生、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顾定国先生分别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向黄淑媵教授表达了深深的贺意。

中国民族学会、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兰州大学中文系等单位发来了贺信。中国民族学会的贺信说：

黄淑媵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曾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等职，并曾任中国民族学会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现任中国民族学会理事会顾问。50年来，黄淑媵教授在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培养了一大批民族学、人类学专业人才，为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淑媵教授治学严谨，知识渊博，著述颇丰。她曾多次赴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她的研究领域很广，尤其是在南方少数民族社会与文化研究、原始社会史研究、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岭南族群文化研究等方面卓有成就，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黄淑媵教授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教学和研究人員学习的榜样。

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的贺信向黄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

50年来，黄淑媵教授治学严谨，爱岗敬业，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非凡贡献。我们坚信她身上所体现出的老一辈学者们踏实的学科作风和奉献精神，将会不断激励无数后来学者。

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的贺信认为：

黄淑媆教授从教50年来，为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学科的发展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黄淑媆教授以其丰富的田野经验给予我们很多启迪，这有利于我们所的学术继承；以其渊博的学识给我们提供了无私的学术指导，这有利于我们所的学术创新。

云南大学的贺信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黄淑媆教授是我国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的著名专家，在这两个学科领域的建设发展中均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享有很高的声誉，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敬重。黄教授在50年的教学、科研学术活动中，淡泊名利，辛勤耕耘，孜孜以求，努力探寻科学的真谛并不断有所创新。作为教师，她为人师表，爱岗敬业，授业解惑，甘为人梯，提携后学，培养了一大批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专门人才，桃李满天下；作为学者，她志存高远，刻苦钻研，追求真知，创新为上，成绩斐然，产生了一大批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的显著科研成果。黄教授在半个多世纪教学科研活动中树立起来的人师风范、学术品格和做出的杰出贡献，都已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绍明教授发来贺电：

欣闻先生华诞，由于在外开会，不能亲赴广东致贺，深表歉意，特致此电，以表心意。恭祝松鹤遐龄，万事安康。

该所冯敏教授贺电称：

值此黄淑媆先生从教50周年之际，谨致以衷心祝贺。先生学养厚实，著述颇丰。育才培人，精英辈出，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贡献。祝先生健康长寿，福乐绵绵。祝会议圆满成功。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孙晓芬女士电传贺诗——《贺黄淑媆教授从教五十周年》。诗云：

黄氏资深学识高，淑界名流倍称豪。媆芳英姿园中娇，教学桃李榜上标。授智育人科研多，五十春秋从教好。十指合掌望中山，贺电鲜花齐称道。

此外，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等单位向黄淑媆教授敬献了花篮和礼物；庄孔韶、何国强、周大鸣、章德清、孙庆忠、黎熙元、何家祥等黄先生的弟子向老师敬献了陶瓷花瓶。

庄孔韶教授是1978年黄先生和林耀华先生合招的硕士研究生，他代表黄先生的弟子发言。庄教授展示了几幅黑白照片，记录了20多年前，黄先生带领他们几个研究生在西双版纳调查的一段生活。庄教授抚摸着照

片，回忆起往事，言语中浸透了对老师的一片真情。

本次会议还收到黄淑婷教授的学生撰写的敬仰老师学风与人格的5篇文章。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庄孔韶、蓝林友合写了《黄淑婷教授人类学研究成就及贡献》一文。蓝林友是庄孔韶教授的博士研究生，算得上是黄淑婷先生的再传弟子。二人认为，在长达50年的人类学教学、科研生涯中，作为中国目前唯一的女性人类学博士生导师，黄先生在原始社会史、文化人类学，以及岭南区域文化研究领域，都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评述黄先生取得的成就：一是民族学名称下的人类学研究；二是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三是岭南区域文化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孙庆忠的《近情乡土无尽景，沉潜民间不了情——黄淑婷教授的学术追求与学术成就》一文认为黄先生半世纪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与其说她是在传播着知识，倒不如说是以人类学家的生命体验传递着一种精神和理念！黄先生作为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全程参与者，黄先生50年的学术研究，可以说是学科发展史的浓缩。回首其学术成就，人们发现，她的专业训练、学术定位和敏锐的洞察力使她始终富有前瞻性地把握着学科发展的主脉。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胡鸿保1982年从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考上中央民族大学（当时为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黄淑婷教授的研究生，专业为民族学，研究方向为原始社会史。他的《学步忆实——从“另类学”到人类学》一文回忆了“从师学艺”的经过。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覃德清教授在为老师从教50周年有感而作的《承前启后，薪火相传》一文中，通过研读黄先生的著作和论文，进一步感受到老师的学风：立场坚定而注重推陈出新，观点鲜明而言之有物，严谨扎实而视野开阔，简明扼要而深刻精辟，田野调查与理论研究相互印证，在平实的陈述中蕴含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在冷静的学术思辨中浸透着诚挚的人文关怀，达到为文为学之执著探索与为人处事之坚守道德良知相辅相成的境界。

中山大学珠海港澳研究中心副教授黎熙元在《理论知识的阶梯、“变熟为生”及其他——谈黄淑婷教授教我学习人类学》一文中也表达了对黄淑婷教授的感激之情。

黄淑婷教授致辞答谢大家的厚爱，她谦虚地说：

各位给我的荣誉和溢美之词我不敢当。50年来，我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人类学者所应做的事，今后我将继续为人类学的事业出一份力，也真诚希望我们的人类学之树永远常青。

之后，黄淑婷教授为代表们作了题为《从异文化到本文化——我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回忆》的报告。黄先生在报告中说，人类学以自己的独特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对科学做出了贡献。田野工作就是对所研究的社会作实地调查，这是人类学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结合历史文献、文字记录及考古等有关资料进行研究，解决要研究的问题。从研究领域看，人类学也经历了从异文化到本文化的扩展过程。如西方学者开始研究的是殖民地的“异文化”，后来也转向了“本文化”研究，中国人类学伊始就是“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并重，现在随着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成长，更呈现出这一并重特征。她本人50年的田野工作就是“前40年研究异文化，后10年研究本文化。”她认为，研究“异文化”的价值在于三方面：认识少数民族的不同文化类型；认识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志；认识民族文化的交融；研究“本文化”可拓展新视野，训练调查者敏锐的直觉思维力，认识到族群的文化特征是人类群体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族文化最显出文化的特征以及不同文化的区别。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人类学，黄先生认为取得了“田野志遍布全国、综合性的论文多、应用研究多”等可喜成果。最后，黄淑婷教授深情地说：

回顾50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田野调查的经历最难以忘怀。它不仅提供了研究的源泉，促进了教学的提高，更激励了我对人类学事业的毕生追求。我曾为所从事的学科的坎坷命运、为作为人类学者经历过的蹉跎岁月深感惋惜，但对自己走上探索人类学奥秘的田野调查之路始终无怨无悔。

二、讨论之一：文化人类学方法的本土建构

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是在一定的方法论的指导下运用一定的研究方式、方法和技术收集、整理和分析资料，进而才得出结论。所以，研究方法是研究者手中的工具，不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就不可能有效地从事科学研究。如果没有好的方法，再好的选题也难以完成，再好的理论也难以在田野中运用，花再大的气力也难以收到预期的成效。反过来，好的方法可让人事半功倍，在田野中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本次盛会共收到人类学方

方法论方面的文章约 10 篇。中国人类学界注重文化人类学方法的本土建构将极大丰富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视角。

周大鸣教授《从参与到参与发展》一文就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和发展学的参与性乡村快速评估，英文缩写为 PRA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了各自的优缺点，为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提供了帮助。周教授认为，自马林诺夫斯基以来，参与观察法便成为人类学传统的、也是行之有效的田野调查方法。20 世纪 70 年代，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危机，那些在发展机构内工作以及在人类学部门为发展领域内的应用人类学培养人才的人类学家，提出了新的发展即“参与式发展”理论，随之人类学便进入了参与发展年代。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一些主要的援助机构如世界银行等开始将其援助重心和发展重点向促进参与式发展方面实行全面转移，参与式发展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就真正蓬勃兴旺起来。近几年来，中国人类学者也做了不少国内发展项目的“参与式发展”评估工作，涉及交通项目、农业项目、牧业项目等，在田野中较好地贯彻了人类学的传统和参与式原则，不仅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不断地丰富了人类学知识，完善了人类学理论，积累了人类学的田野经验，展现了人类学的价值和魅力。可以说，“参与式发展”为人类学者提供了一个实验园地，有利于他们走出“田野中的书斋”，更好地把自己所积累的知识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相应，人类学在文化理论、田野调查等方面的进步，又为“参与式发展”的评估、决策、实施、管理等“发展过程”提供更合理的工具，使其趋于科学，愈能达到理想的正发展效果，因此，人类学与参与式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接轨，体现出“双赢”效应。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张小军博士在提交的《民族志方法论的互补性》一文中提出了“互补说”。他从民族志作为人类学方法论的危机（知识危机、专业危机、学科化的概念危机）切入，以人类学史上许多理论互补的例子如在对克钦—景颇社会政治变动的研究中，利奇“钟摆模式”和王筑生“动态适应模式”的互补，针对中国的亲属制，费孝通“差序格局”和作者自己提出的“干涉—共振格局”互补，再如普里查德 (E. Evans-Pritchard) 研究的苏丹努尔人 (The Nuer) 和巴瑟 (F. Barth) 研究的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帕散斯人 (Swat Pathans) 都有一个分割系统 (segmentary system)，在依从什么原则进行社会秩序整合上，普里查德“结构规则” (structural rules) 与巴瑟“规范规则”就具有互补性等

(normative principles) 为论据，说明了理论互补原理对人类学从事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意义。“民族志方法论的互补，强调了如下观点：人类学家从事民族志研究的不同方法都具有学术的合法性。批评的辩论不但不会削弱互补原理，反而因为各种方法的自我完善，而对完备的认识有所贡献。首先，互补的本体论基础是事物存在本身具有的超过二象的多象性质。其次，从认识论来看，认识主体（人类学家或者人）的参与是这种多象性质产生的重要原因。第三，从方法论角度，人类学家的田野研究无法摆脱研究对象，对具体要素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其多样性的方法。”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建民在《人类学研究方法教学刍议》报告中，结合自己多年来的课程教学经验，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人类学研究方法教学进行了初步认识。王教授认为，人类学研究方法，可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认识论，即有关我们如何认识事物的研究，如理性主义原则还是经验主义原则、实证主义还是人文主义等；二是一般方法，即有关研究策略的选择和运用，如怎样做参与观察，如何查资料等；三是对特定研究课题而言的，即在研究中对有关具体技术的选择。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教学有三个途径：一是学院训练型，二是田野实践型，三是学科史熏陶型；并分析了各自的优缺点。当今使用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教材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以介绍各种研究方法为主，通常辅以方法论讨论；第二类以介绍人类学一般研究程度见长；第三类是调查大纲或资料整理要目。最后，王教授指出，在人类学调查方法的训练中，原著阅读和人类学方法的课堂教学应当是相辅相成的，但更为重要的是田野中的实践。

兰州大学武文教授在《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中国化——创建中国文化人类学学派的思考》一文中指出，中国需要自己的文化人类学学派，而且需要多学派，这样才有利于推动学科的发展。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何国强博士的论文《我伴三人哲界行——析博厄斯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根基》则从哲学的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本质与现象）角度，分析了人类学三位大师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和埃尔文·普里查德思想的哲学根基，从而把人类学的文化理解与田野调查提高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高度来解构。作者的结论为“人类学实践中提出的基本问题大都与认识论、方法论有关，有的还与本体论交融，如语言。如果说文化是一个过程，使涉及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反之，则意味着文化的孤寂和静止。过程论属于历史科学范畴。过程论或者静止论与时间、空间、

运动、规律相连, 又属于哲学范畴。某些文化模式, 例如, 语法、心理规则等等, 它们是后天出现的, 还是先天就有的, 不同的回答可以归入反映论和先验论。人类学家一般不会询问物质与精神谁是第一性, 谁是第二性, 这个问题被埋在文化的底层结构中, 但是, 只要他们在实践中碰到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就不可避免地要反省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在解决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时, 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态度截然不同。传统的英国哲学倾向经验实证, 德国哲学崇尚理性分析, 美国哲学则把实用放在第一位, 现代英美哲学讲语义分析。人类学家受不同的哲学熏陶, 便有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倾向。方法如果不与认识论挂钩则降低为技术或技巧之类的东西, 难以升华。”从而厘清了人类学与哲学的关系, 指出了在人类学训练、田野、理论等方面哲学知识的重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张继焦博士在《传统的人类学调查方法是否还适用于现代社会——人类学方法的特点、不足和改进方向》一文中根据人类学推崇的“类比分析法”, 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 与其他学科进行比较, 找出人类学调查方法的特点; 第二, 在比较的基础上, 从人类学本身的传统做法中, 找出人类学调查方法的不足, 并指出改进方向。他认为, 今后中国人类学调研方法的改进方向是: 第一, 更新知识结构, 是改进人类学调查方法和研究水平的前提和基础。第二, 引进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方法。第三, 学会“向上看”, 保护相关利益群体权益和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第四, 逐渐养成提出“研究假设”习惯, 推动人类学理论创新。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陈运飘副教授《工商时代社会文化发展与中国人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创新》报告谈了在新时期文化人类学方法借鉴、创新的重要性。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何家祥在《从范式到阐释——试论文化人类学的表述危机及对策》中, 探讨了后现代主义背景下人类学理论方法的转型和走向, 强调认识论与人类学的密切关系, 展示了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利于文化人类学发展的一面。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周玉蓉讲师在《人类学本土化理论综述》中, 对近几十年来人类学兴起的本土化思潮进行了反思。人类学的反思也促使从事社会研究的学者对自身的社会定位提出了新的质疑。这种反思含有跨文化比较方法的意味。跨文化比较方法作为文化人类学最基本的方法之一; 它

的基本前提是把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作为样本，对这些资料作比较研究，以便验证对人类行为的假设。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威廉·哈维兰（W. A. Haviland）说过，理想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应该产生于广泛的比较研究基础之上，跨文化研究者考察世界性实例为的是探讨他们对文化现象的解释是否能广泛应用于全世界。

方法是一门学科的重要标志。目前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各门学科，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成果。反过来，人类学也在不断地汲取别的学科的先进经验，藉以丰富自己的田野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助理、《社会学研究》副主编罗红光博士就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他批评人类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因为它主张方法的不可重复性。但也要承认人类学方法在运用层面上的个人特色，正像老师带学生下乡，老师的“顿悟”或感悟就比学生强，学生间的“顿悟”也不一样。人类学讲的是“情境”、整体参与，这与科学主义很不相同。所以，人类学应注意多学科之间的沟通，以进一步提高、丰富自身的理论和方法。

三、讨论之二：文化人类学理论的热点透视

理论是基础。如果没有丰厚的理论，方法、应用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相应，探索文化人类学理论的新发展构成大会的一个主题，本次盛会共收到人类学方法论方面的文章 15 篇。代表们的探索可分为四面：

1. 理论交叉。学科分化与整合是当代学科发展的基本特点，在这一潮流中，人类学也广泛汲取别的学科的理论，以丰富自身，求得突破。如近年来历史人类学的兴起便是例子。

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彭兆荣教授《人类学仪式理论述评》的报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张应强副教授所提交的《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论文中，对历史人类学的概念、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研究意趣以及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发展等问题做了探讨。尤其是有些代表对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理论的交叉与借鉴并不停留在论说阶段，而是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在田野中发现、梳理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理论的相关性，以达丰富人类学理论的目的。

2. 理论互补。理论突破固然可喜，但希望时时都有理论创新是不现

实的。那么如何用传统理论来说当前事实呢?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龚佩华教授在《景颇—克钦族政治制度及其文化人类学理论》的报告中, 结合自己多年来对景颇族的研究, 详细地比较了利奇、木然、莱曼、王筑生等在克钦人政治制度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考察了贵族贡萨制 (the gumsa) 和民主贡老制 (the gumlao) 的起源及变动情况, 认为文化人类学理论虽多, “但几乎没有一个理论能够阐释所有民族的多文化, 即不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不仅因为每位人类学家都有自己的局限 (如视点局限、思想局限、知识局限), 更因为人类各群体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不同文化及其缤纷的变迁历程, 因而难以被各家, 各别的理论所包容、概括, 其中一些理论甚至是对立的, 当然也有相互补充的。”

3. 理论借鉴。借鉴别的学科理论, 可使人类学从与学科传统不同的角度研究文化, 透析社会, 从而产生新的认识成果。如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房学嘉副教授《试从民俗古文书看梅县乡民的社会关系》一文利用古文书提供的资料, 探讨了粤东梅县传统社会的结构与原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何星亮研究员《略论社会—文化冲突的几个问题》就是借鉴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冲突理论, 探讨了“文化或社会”冲突的性质、产生的原因及其条件、功能、强度与持续时间和冲突与社会—文化结构等问题, 认为“冲突是社会常态, 而不是病态。冲突与均衡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一对主要的矛盾现象。凡是有人群的地方, 必然存在冲突和均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问题是如何减少冲突和正确处理冲突。”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柯群英副教授的《人类学与散居人口研究: 侨乡研究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一文,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讨论了侨乡研究的模型即建立华人文化网络, 包括起源地、地方式的海外华人文化中心、全球化的海外华人文化中心等, 以解释海外华人的情绪、感情、经济需求等与侨乡的关系。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周光复教授也谈了在人口研究中田野调查的重要性。

4. 理论的反复检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庄孔韶教授在论文《人类学的回访研究及其学术意义》中详细谈到这个问题。他提到上个世纪 8 个著名田野点的回访调研, 在述评中涉及 8 位先行者和 9 位人类学新人, 他们是林耀华—庄孔韶—阮云星; 杨懋春 (Martin C. Yang) —戴瑞玛 (Norma Diamond) —潘守永; 葛学溥 (Daniel Harrison Kulp) —周大

鸣；许烺光（Francis L. K. Hsu）—张华志、段伟菊；杨庆堃（C. K. Yang）—孙庆忠；波特夫妇（S. H. Potter & and J. M. Potter）—覃德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蓝林友等。

庄孔韶指出，上述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初起个案始于1918年（葛学溥）和止于1985年（戴瑞玛博士和波特夫妇）。没有人规定从初起个案到回访行动的时间间隔。但从人类学关心社会文化变迁的主题来讲，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历过一个和多个巨大社会变故的社区的回访工作，似乎比类同的相对平静的社区的回访工作更值得。

他还谈到20世纪人类学先驱者的中国本土农民社会田野转向（从所谓部落社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回访重新找到审视同一调查点的机会，延伸了先驱者作品的学术生命与意义。论文作者多年推崇与支持乡村人类学田野回访的工作，是加强学术研究深度的构想以行动。回访不是只限于以今日的知识批评昨日的知识，而是在新知识的基础上提供再诠释。

跨越时空巨大变迁的同一社区有时会发现不可比的主题。回访的工作加强了社区的过程研究，其间多种被抽绎出的重要学术问题的解答获得了综合的机会，因为触类旁通的观察恰恰产生于社区过程之中。回访研究证明，多种声音的呈现需要历史的向度。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构架应和区域或地方民俗解释系统并存，学者文字的诠释应和农民行动者的信条同时呈现，是新时期人类学田野调研的重要观察。

人类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头戏。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教授顾定国在报告中谈了“应用人类学与学术人类学的关系”。他指出，费孝通先生把人类学称作“人民的人类学”，一贯提倡的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人类学，实际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人类学在商务、医疗、教育、发展等方面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学的发展。顾教授肯定了近年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世界银行资助的国内项目评估中所做出的成绩，并对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教育人类学的发展非常重要；二是要有很严格的学术培训，因为应用靠的是深厚的理论。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老一辈民族学家容观复先生也在《面对现实，迎接挑战》的发言中，呼吁人类学在应用中确立自己在学科体系和人们心中的重要位置。在随后的讨论中，学者们集中就“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谈了各自的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色音研究员作了《应用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报告。他以“活态文化遗产”来概括至今仍然活在民间的乡土文化遗产，如目前仍在使用的民间器物、乡土玩具、民俗工艺等具有较高文物和艺术欣赏价值的有形文化遗产，又包括神话、传说、故事、史诗、歌谣等民间口头传承和民间舞蹈、民俗仪式以及乡土游戏等行为传承。色音认为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体，任何民族都存在既想保存传统文化、又想发展传统文化的矛盾心理。不过，任何“传统”都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把传统文化看作一成不变是错误的，不能够以“保存”、“保护”的名义来阻挡一些民族传统文化的合理发展。正确的做法是在保护工作中，各地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条件，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和政策，将传统的保存方式和新型的保存方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保护与发展并重的目的。

云南大学马京副教授以云南省古镇黑牛镇为例谈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保护、开发和利用”的问题。黑牛镇曾是有名的“盐镇”，买卖很兴隆，那么对于这类曾经辉煌过的名镇，今天如何来发掘它，在旅游中如何来保护它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问题。马京认为，首先应对其作深入的研究，即采用文献查阅、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相结合的方法对古镇进行民族志描述，然后再进行比较归类，加以阐释，发现古老文化的现代价值。如熬盐要烧柴，易造成林木的破坏，这就涉及人与自然怎样达到和谐的问题，我们要学会从古人那里发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

项目评估是近年来人类学应用的另一大领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周大鸣教授系统地介绍了自己的体会。中央民族大学庄孔韶教授也谈了自己在做项目过程中的认识。他以在长江三峡文物保护项目（1996—1998）中对两个村庄的谭姓的鉴定为例，指出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合作的重要性，强调了社会的“集体记忆”和史料相结合的必要性。庄教授目前正在大小凉山从事艾滋病与吸毒防治的项目，他在田野中发现彝族在戒毒问题上利用家支制度遗留下来的传统习惯法和仪式，成功率高达60%—70%，远高于戒毒所的3%—5%。如是，就把艾滋病、吸毒等自然科学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纳入了人类学的视野，而且人类学也能够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

族群是近年来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尽管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运用族群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已十分流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

教授、香港大学语言学系博士生张振江《香港开埠初期的华人族群与族群关系》讨论了香港开埠初期华人族群的形成、分布和居住模式; 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后、西北民族学院副教授马建春《族群关系中的文化认同: 以河湟地区为例》从信仰、语言、民间文艺等方面探讨了在族群关系的认同、变迁中的文化意义。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陈华副教授的文章《广东外来人群的适应性》探讨了广东外来人群的气候适应和心理适应及其与健康状态的关系。

四、讨论之三: 宗教人类学的现代转变

宗教人类学中的民间信仰是人类学研究的永恒课题, 且又具有学科交叉性(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哲学等), 不易辨清, 更何况年代越来越久远, 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但是, 近年来民间信仰在中国及亚洲等地方的复兴, 又使人类学不得不正视这一古老课题。

东京都立大学刘正爱博士研究生的《东北地区的民间信仰与满族的认同: 以地仙信仰为例》一文, 从个案调查出发, 指出地仙(也称草仙, 是指狐狸、黄鼠狼、蟒、蛇等动物经过千年修炼而成的仙, 地仙是概括性概念, 日常生活中人们一般用胡仙、黄仙、长仙、蟒仙等称呼。每个地仙都有其人格化的名字, 这些名字使人联想到中国父系家族的辈分)信仰在东北极其盛行, 除了个人与地仙的关系外, 家族与地仙的关系显得尤其重要, 从而进一步将民间信仰与民族认同联系起来。

中山大学珠海港澳研究中心黎熙元博士在《神的体系和乡村人的社会视觉》一文中, 以自己在广东清新县D村的田野调查资料作分析, 认为民间信仰中的神的体系既反映了传统礼制和政治的等级观念, 也反映了一种以内——外、主——客分类为特征的界域性观念, 两者共同构成村里人的社会视觉。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讲师朱爱东《国家地方与民间互动——巍山民间宗教组织圣谕坛的形成与演化》也是以巍山田野资料为基础, 探讨了在国家、民间的互动中, 民间宗教组织的形成规则。以上3篇相关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文章全自出于女人人类学者之手, 其调查资料的翔实, 观察力、理解力的细腻, 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谭公信仰中的“求神仪式”》是陈海源提交的论文, 他以自己的家乡——广东省惠州市平潭镇的谭公信仰为例, 说明“求神”仪式是谭公信仰

的主要内容，具有强烈的象征主义色彩，“求神”仪式有几个明显的功能，表现出谭公信仰中的“人的圣化”和“神的俗化”。

此外，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渡边欣雄教授在《怎样理解中国汉族的民俗宗教》报告中以“萨满教”为例，指出日本社会人类学一直是模仿欧美的社会人类学来理解中国汉族宗教的，将中国北方的萨满教和中国南方的巫术理解为萨满教的，但是这样理解则很难理清萨满教与其他的民俗宗教之差异。于是，渡边教授以自己在福建省北部的田野调查为例证，结合李亦园先生的“中和位育”论和中国传统的风水论，认为萨满教是以人物及其附体状态来定义的，东亚民俗宗教的特征不在于宗教家本身，而是宗教家与宗教对象的关系才是重要的。萨满教研究出自于欧美的理论，欧美人把他们的宗教体系中所不存在的宗教现象按它们自己的方式命名，萨满教研究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起步的。一种不靠祭司（神父）而是靠萨满的萨满教这种异教现象由此便可得到理解。但是中国的宗教不是靠宗教家这个行为主体来决定其特征的。毋宁说中国宗教是以作为手段和行为本身的“术”来决定其特征的。这种认识是来自人们行为的认识和分类，是与欧美人类学的认识恰恰相反的。因此在方法上，今后我们要关注此类中国土生土长的民间理论和思考方式，而不是单向的欧美式的理论和思考方式，将两者相比较，以发现文化的真谛，这才可称得上是理论来自人民又面向人民的人类学，即费孝通教授所倡导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

与渡边欣雄先生相照应，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人类学博士麻国庆的《祖荫下的社会认同：宗族、同族与门中——“传统”的复兴与创造的东亚人类学的比较研究》一文，通过对中国福建南平樟湖镇、江西赣南客家的宗族，日本长野县小诸菱野区村落的同族与祖先、冲绳县金武町屋嘉区村落的门中与祖先祭祀的比较分析，认为在像中国和日本这些东亚国家中，存在着类似的社会结构如宗族、同族和门中等，而其得以延续的重要基础是祖先观念与祖先崇拜，存在着一套相对应的价值体系，即儒家文化，这与福特斯的调查的非洲的无文字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并提出，像中国的宗族复兴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此之前因为意识形态如“文化大革命”等，消灭“传统”成为当时的口号。但是，像日本本土、冲绳并没有经历过中国式的意识形态，为什么也存在着传统的复兴乃至创造的问题。并认为这也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因而对于“传统”的延续、复兴和创造以及文化的生产的研究，是人类学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